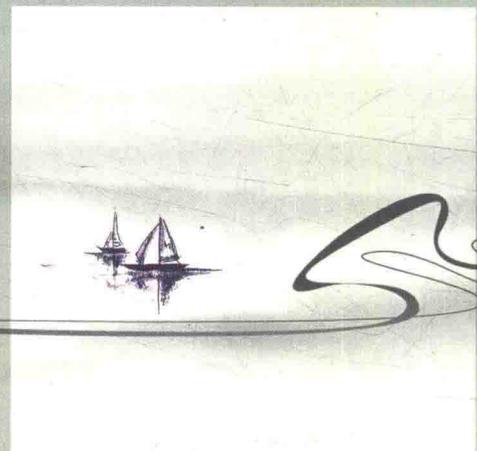


禅和之声

「中国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
研讨会论文集

【上册】

明生◎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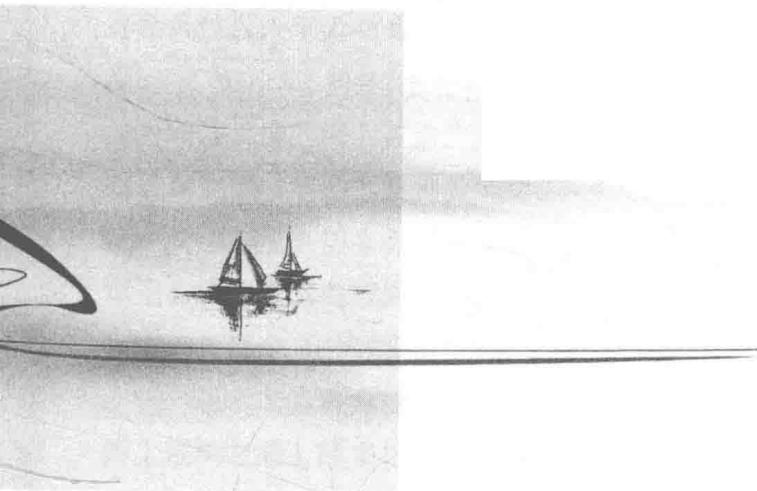
宗教文化出版社

禅和之声

『中国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
研讨会论文集

上册

明生◎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禅和之声：“中国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论文集 / 明生主编。
-- 北京 :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188-0323-1

I. ①禅… II. ①明… III. ①禅宗-宗教文化-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B94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5179 号

禅和之声

“中国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论文集
明生 主编

出版发行：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010-64095215(发行部) 64095363(编辑部)

责任编辑：杨登保

版式设计：贺 兵

印 刷：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版本记录：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47 印张 850 千字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88-0323-1

定 价：128.00 元(上下册)

序 一

广东省佛教协会会长 明生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悠久的人文不仅得益于历史的传承和缔造,更得益于中外文化的不断交流与融合。而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传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关于中国与南海诸国接触的记载。及至唐宋,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达到了高度繁荣状态,极大促进了各国之间经济贸易以及政治和文化的相互交流。清代政府虽然实行海禁政策,但也保留广州作为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施全面对外改革开放,广东也因为毗邻港澳台与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区域优势而成为全国对外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可见在历史的传承中,中国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交往在岭南大地上从未间断。

秦汉以降,佛法东来,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广东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以及佛教由海路传入中国的初地,已被学术界和文化界所共同认可。据明成化《广州志》所载,迦摩罗于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抵达南海,建立了三皈寺与仁王寺。随后历代高僧接踵而至,如光孝寺的创建者,被誉为“大毗婆沙”的昙摩耶舍尊者、第一个在南方(光孝寺)建立戒坛的求那跋陀罗、为中国带来第一棵菩提树的智药三藏、旧唯识论的传承人真谛三藏、被称为“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三藏等等,他们不畏海上风浪肆虐,不顾自身安危,历经磨难,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广东。通过佛教文化的传播,推动了岭南佛教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对于中国佛教义理的完备及宗派的成立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与此同时,与中国传统文化成功融合的佛教,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外传于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地,在佛教“一来一往”的过程中,海上丝绸之路担当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致力于亚欧非大陆以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的可持续发展,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在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为了响应“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发挥佛教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佛教协会的指导

2 禅和之声

下,广东佛教界着力推动和举办了一系列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活动。于 2015 年 11 月 16 日至 17 日,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广东省佛教协会、珠海市佛教协会主办,广州光孝寺、珠海普陀寺、珠海金台寺共同承办的“中国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系列活动在珠海隆重举行。国家宗教局副局长蒋坚永,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林雄,广东省人大副主任雷于蓝,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温兰子,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世界佛教联合会秘书长攀洛·泰阿利等出席启动仪式。来自海内外、港澳台等东南亚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高僧大德、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 2000 多人共同参加了本次活动。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内容“中国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也圆满举行。大会分别以“海路佛教传播的意义和作用”、“海路弘法高僧大德生平事迹研究”、“南海航道与岭南佛教发展之关系研究”三个议题进行研讨。

本次研讨会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认为:“在当今中国联合‘一带一路’沿途的各国人民共同发展经济、文化,推进亚洲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营建的时刻,深入考察自古以来两个丝绸之路在联接中外佛教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书写自古中国与各国友好交往的篇章,相信对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信任是有着积极意义的。”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的 Lewis Lancaster 教授则透露到: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课题在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引起广泛的关注。许多国家不仅完成了相关研究所的建设,甚至在美国博物馆已经使用 3D 体验技术来增加人们对于亚洲佛教文化的了解。韩国月道法师说:“自上世纪中韩两国佛教界不断地加深交流与合作,特别是与广东佛教界一直都有紧密的联系。中韩佛教界再现了唐宋时期的繁荣交往。以光孝寺为代表的广东佛教在中国佛教界具有时代意识,‘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不仅有助于佛教文化的传播,对于佛教世界化、亚洲乃至全球的和平稳定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研讨会共收到学术论文 80 多篇。各国专家学者纷纷提出自己对于“岭南佛教文化”的见解,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南大门,广东佛教在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有着积极作用。学术盛会,文化盛事,还要以文字和书籍的形式来扩大传播,流传于世,裨益后人。研讨会有成果即将成册付梓,希望通过“一带一路”文化主题的研讨,铭记那些为了完成自身信念与佛教使命的高僧大德,学习他们不惧艰险的大无畏精神,从古人的身上感受“一带一路”文明精髓的所在。惟愿见闻者,智慧增长;参与者,福业绵长!

2016 年 10 月 26 日
于广东省佛教协会

序二 中国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

——新研究与新成果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 王邦维

佛教传入中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对于佛教，从知之不多，到知之渐多，佛教也从一种外来的、最初所谓的“夷教”，被中国人接受，很快就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宗教。

但是，佛教从印度最早是怎么传到中国的，这一点，却有不同的说法。传统的一种说法是，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明帝梦见“神人”，“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因此派出使臣到大月氏，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带回中国，从此汉地有了佛教。这就是后来经常被人提到的“永平求法”的传说。不过，经近代学者们的研究，佛教传到中国的中原地区，其实还要更早一点。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西域大月氏国的使臣伊存来到长安，有中国人向他学习佛教，伊存于是口授《浮屠经》。这一记载见于《三国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书中的《西戎传》。

这两种说法，都与陆路有关，但也有另外的一种说法，认为佛教传到中国，经过的不仅有陆路，也有海路。这方面的证据之一，是江苏连云港的孔望山有摩崖石像，其中被认为有佛的形象。只是人们对这些摩崖石像以及他们刻成的年代的理解，目前还很不一致。是不是最早，也还有些问题。

不过，在我看来，对哪方面最早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必要做过多的争论。说佛教最早从陆路传来，因为有很多的文献记载，不可否认。但中国古代与印度之间的交通，不仅限于陆路，也有海路。佛教通过海路传到中国，不仅可能，也完全是事实。就这一点而言，陆路与海路，哪一条更早，并不是太重要。

关于中印之间的海路交通，文献中的记载其实很早。《汉书》卷二八《地理志》讲：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
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
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其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

2 禅和之声

来皆献见。……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之之南，有己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日南的旧地，在今天越南的中部。徐闻、合浦在今天中国的广东和广西，其余的地名，学者们之间，考证不一，但黄支指的是今印度半岛的某一处地方，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分歧。一般认为，黄支就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讲到的达罗毗荼国的都城建志补罗。因此，依照《汉书》的这段记载，从汉武帝时代开始，中印之间通过海路就有了往来。这条海路，古代称作“南海道”，即今天所讲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就是通过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佛教在从陆路传到中国中原地区的同时，也有一部分直接地传到了中国的南方。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联系，有两条途径，一为陆，一为海。我们今天说的中国佛教，因此也有两个方面的来源。两者相较而言，过去的佛教史研究，前者讲得多，后者讲得少。中国佛教究竟与海上交通或者说海上丝绸之路有什么关系，我们的了解，则相对不够。

说相对不够，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长期以来，对于中国的中原或中心地区的佛教讲得多，研究得多，因此情况相对比较清楚。南海方面——不管这里说的南海指的是与南中国海相邻的中国两广地区，还是历史上讲的广义的南海，即东南亚地区——的佛教研究则比较少，了解也不多。第二，从海路传来的佛教，历史很悠久，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情况有所不同，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因此，中国佛教与这些地区的佛教曾经怎样地互动，二者之间是什么一种关系同样也就不是很清楚。

这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大名鼎鼎，被认为是中国禅宗初祖的菩提达摩。菩提达摩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菩提达摩是哪里人，从哪里来，有过不同的一些说法，但揆之情理，说菩提达摩是印度人，应该没有问题；菩提达摩从海路来，最早到达的是广州，也没有问题。但菩提达摩来华，当时为什么会选取海路，其实值得我们思考。我们相信菩提达摩确实来自南印度，但这不够。从菩提达摩来华的行程，首先要看到的一点是南印度与南中国之间的海上的交通路线。佛教通过这条路线向中国传播，有许多事例，菩提达摩只是其中之一。菩提达摩在广州留下的遗迹，至今是人们瞻仰的对象。

再一个例子是陈真谛。陈真谛是中国佛教史上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真谛的贡献，包括翻译，但不仅仅是翻译。真谛最早把印度大乘瑜伽行派，即“有宗”的学说比较完整地介绍到了中国。真谛是西印度人，到中国之前，他先到达的地方是扶南。扶南曾经是古代中南半岛上历史最久，地域最大的古国，地域大致包括今天的柬埔寨和越南的南部。当时的扶南，有佛教，也有印度教，二者的影响都很大。扶南的佛教，显然有不同于北传佛教的特点。究竟怎样，过去讨论的人很少。真谛在扶南的佛教界，很有名也很有影响。真谛在扶南的经历，与他在中国所传的学说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呢？中国佛教在学理上的发展，与真谛有联系，是不是也与扶南有联系呢？

在真谛之前,扶南的僧人,也有不少通过海路来到中国。扶南的佛教,对中国就有一定的影响。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梁武帝时从海路来到中国的扶南僧人曼陀罗,题目是《扶南沙门曼陀罗事迹钩沉》。这篇文章,后来又用英文改写,发表在荷兰出版的一份学术杂志上,题目 The Buddhist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Ancient Cambodia: Śramaṇa Mandra's Visit to Jiankang,则特别强调了扶南佛教与中国的关系。我在文章中还提到另一位扶南的僧人僧伽提婆、唐代中国的义净以及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

除了印度的陈真谛,历史上通过海路来到中国的外国僧人还有许多,其中可以而且应该提到的如僧伽跋陀罗、昙摩耶舍、耆域、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那提、金刚智等等。熟悉佛教史的人都知道,他们都是佛教的高僧,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

再有的例子是佛教的经典。从海路传来的佛教经典,不仅与从海路来中国的外国僧人有关,与印度有关,同样也与南海的佛教有关。一些在北传系统中见不到的经典通过海路传到中国,例如《善见律毗婆沙》与《解脱道论》,甚至还包括佛教上座部的《五百本生经》和《上座部律》以及正量部的《三密底耶经》和《律二十二明了论》。根据《出三藏记集》的记载,《五百本生经》和《上座部律》的译者是“外国沙门大乘”,译出地点在广州。《善见律毗婆沙》的译者是印度僧人僧伽跋陀罗,译出的地点在广州的竹林寺。《解脱道论》的译者则是扶南僧人僧伽提婆,译出地点在建康,即今天的南京。《三密底耶经》的译者是印度僧人竺法眷,译出地点在广州。《律二十二明了论》的译者即陈真谛,译出地点也在广州。这些经典,从海路传来,翻译又大多在广州。这中间不是可以说明很多问题吗?

即便是不仅仅属于南传佛教系统的经典《楞伽经》,也是通过海路传到中国,然后被翻译出来。对于中国禅宗的形成和早期的发展,《楞伽经》的重要意义这里完全不需要多说。

因此,在我看来,在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充分地注意到,与陆路方面相比,海路传来的佛教,既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既有时代的特点,也有地域的特点。可以探讨和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这里我不过只是举出了几个事例而已。

对于佛教与海上交通之间的关系,我个人一直有很大的兴趣。1979年,我到北京,跟随季羡林先生念研究生,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都与佛教以及中印之间海路的交通有关。其后三十多年,我一直关心这方面的研究。只是这个题目太大,其中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我因此而得到的一个感觉是,只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才可能有所推动。许多有关佛教与海路的问题,也只有在得到新的认识之后,才可能获得对中国佛教的历史的全面的理解。

2016年11月16到17号,广东省佛协在珠海举行以“中国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为题的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一天的学术研讨会。为什么要开这样的学术研讨会,我的理解,就是要对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做探讨。最近一年多来,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动和会议不少,但把中国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召开学术研讨会,不一定是第一次,但以参加会

4 禅和之声

议的人数而论，规模应该说是最大。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共 74 篇，撰写者大部分是国内的学者，也有一些是来自国外的学者。论文以佛教为主题，结合海上丝绸之路，做了广泛的讨论。从时间上讲，从汉代佛教初传开始，直到近代和当代。从地域上讲，从中国南方佛教的发展，到南方佛教与中原地区的关系。从内容上讲，既涉及到佛教的求法史、译经，也涉及到从海路海上传来经典的义理，佛教僧团的发展，佛教与社会。如此广泛的议题，对于提高佛教研究的水平，增加人们对佛教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了解，意义是显然的。这样的会议，也扩大了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我们因此不能不称赞广东省佛教协会举办的这次活动，也不能不称赞明生法师的高见卓识。

会议之后，主办方决定把论文结集在一起，正式出版。这样做的目的，我想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次会议的成果，由此进一步推动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论文中反映出的一些研究成果，也为理解中国佛教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新的视野。通过学者们的这些新的研究，当年从海路传到中国的佛教，形象也就显得更加的清楚和真实。佛教讲“如法”、“如实”和“如理”。学术研究，重点则在“如实”和“如理”，教与学可以互补，同时也可以互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佛教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中间与佛教相关的学术研究发挥过作用，以后也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就这一点而言，现在放在大家面前的这本论文集正是一个例证。佛经中常说“功不唐捐”，诚此之谓也。

我说的这些，质之诸位善知识，不知以为如何？

2016 年 4 月 3 日

目 录 | CONTENTS

上 册

序一	明 生(1)
序二 中国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 ——新研究与新成果	王邦维(1)
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国佛教	杨曾文(1)
南海佛教与顶层设计	黄夏年 于 光(8)
介绍几位海外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的佛教研究	龙达瑞(14)
Atlas of Maritime Buddhism	Lewis Lancaster(24)
论古印度佛像的海上传播之路	赵 玲(33)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路佛教传播	刘林魁(47)
海路交通与说一切有部学说在中土的发展	许 潤(59)
试论海路佛教两高僧的医学成就及当代意义	王东承(67)
晋唐南海道中、印佛僧故土观念比较 ——以汉文资料为中心	何方耀(74)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先驱义淨法师西去求法的贡献及其思想刍议	金易明(85)
略论义净大师对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	习细平(99)
汉晋时期印度僧人来华述略 ——兼论海路在佛教初传时的地位	于卫青 陈 寒(105)
论郑和的佛教信仰 ——兼论郑和与中外佛教交流与传播	何孝荣(115)
海上丝绸之路与怀度禅师香港弘法考	黄华明(128)
关于柳宗元《大鉴禅师碑》	孙昌武(139)

2 禅和之声

Gunabhadra to Bodhidharma: The Lankāvatāra Sūtra and the Idea of Preaching without Words Charles Willemen (147)	
求那跋摩与大乘戒 温金玉 (156)	
刍论求那跋陀罗三藏对中国佛教思想所产生的影响	
——考察《四卷楞伽》与初期禅宗史之间的虚与实 胡建明(法音) (169)	
求那跋陀罗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 达亮 (179)	
论菩提达摩“无心”思想及其与《坛经》“无念”思想的关联 郭延成 (194)	
菩提达摩:岭南禅学初曙的精神性标志 徐仪明 (203)	
菩提达摩见梁武帝之公案再勘 姚彬彬 (209)	
真谛于广州译疏唯识论典所开展之唯识思想 施凯华 (214)	
《金七十论》与真谛和岭南佛学 严耀中 (228)	
略述真谛三藏在广州译经弘法的情况及影响 昌莲 (236)	
略论南北朝时期广州译经	
——以真谛三藏为视角 王思佳 (245)	
《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的禅学意义 张勇 (252)	
梁真谛译《大乘起信论》的思想特色 伍先林 (260)	
真谛三藏在广州的译经弘法 陈侯霖 (267)	
真谛三藏所译《金刚经》的特色 刘洋 (275)	
鉴真在岭南的传戒活动 彭瑞花 (284)	
大汕其人之文献学考证 王振宇 (292)	
从《楞严经》中探讨“世界相续”的科学观 陈士滨 (305)	
从般刺蜜帝译《楞严经》至圆瑛讲义之楞严学发展史论 黄连忠 (322)	
《楞严经》的佛学思想及其意义 杨维中 (333)	
《楞严经》喻理探究 荆三隆 (349)	
浅析《楞严经》耳根圆通法门 段基亮 (356)	
不空三藏在岭南弘传密法考 崔红芬 (363)	

下册

唐休咎大师生平与道场考 王元林 (375)	
木陈道忞禅法初探 喻静 (382)	
吉津宜英的《大乘起信论》观 张凯 (393)	

擦亮“西来初地”品牌,将广州建设成为“一带一路”的世界禅学文化研究交流中心

- 关于广州“西来初地”及其相连禅学文化的调研报告 黃伟宗 王元林(400)
 憨山大师中兴曹溪禅的启示 徐孙铭(405)
 南能北秀同源同宗 弘 隆(411)
 中国佛教的发展与广州 织田显佑(415)
 岭南丝带海上花

- 写作《广东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一书的感想 徐文明(419)
 海上丝路与东汉三国岭南佛教 周永卫(424)
 浅议岭南在中国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和发展中的作用 释宽江(434)
 六朝岭南译经群体考略 姚潇鵠(446)
 六朝时期佛教在岭南的传播

- 以广东佛教为中心 陈明波(454)
 汉唐海上丝路与佛教在岭南的传播 刘正刚 王漫丽(463)
 佛教东传韩国及其本土化特色 李海涛(473)
 佛寺与域外植物的引进和传播

- 以佛寺中的“五树六花”为中心 王芹娟 魏露苓(484)
 交流与冲突

- 明末利玛窦传教团在岭南与佛教关系的历史演变 李明山(494)
 利玛窦与广东佛教之交涉 梁世和(503)
 明清之际传教士与岭南佛教界的交流与冲突 黄 豪(509)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与岭南佛教界的交流与冲突

- 以憨山德清及其周边士人を中心 王红蕾(519)
 虚云和尚与东南亚佛教 欧阳镇(525)
 光孝寺梵僧事迹及其后世影响

- 以梵僧“悬记”与“译经”为视角 刘军峰(537)
 SPOC 与佛学院教育 资小丽(545)
 清初岭南禅僧的文化性格及其思想效应 陈永革(550)
 南华寺六祖惠能遗址考析 林有能(556)
 从三个关键期看岭南禅文化的意义 路永照(574)
 苏轼与岭南佛教的因缘

- 以苏轼与重辩长老之交游为核心 黃惠菁(581)
 佛教“中国化”的契理管窥 谭忠诚(600)
 再说“顿渐”之别
 ——佛家的分别与无分别 释禅显(609)

4 禅和之声

论禅宗“两般病”命题

——基于岭南佛教云门宗之思想	丁建华(619)
岭南佛教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刘明沫(626)
遗民僧与岭南佛门	吴 平(637)
民国时期广东佛教慈善公益事业研究	明成满(648)
浅论明代岭南心性哲学及《坛经》	刘 强(657)
石头希迁禅法及其海外传播	叶枝青(666)
广东佛教发展的历史轨迹	张翔宇(674)
清末广州长寿寺事件透视	许效正(679)
龚自珍《己亥杂诗》创作背后的佛学杂谈	资小丽(689)
近代中国佛教经学研究	
——以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为例	龚 隽(695)
佛门归依理趣浅说	冯焕珍(710)
佛性如风	
——佛教艺术的开示(之一)	邓启耀(726)
禅道汇通的观念建构与境界追求	冯达文(730)
都市佛教的兴起	
——珠海普陀寺道场考察记	王 翔(734)

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国佛教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 杨曾文

自从习近平主席提出国际社会立足打造“命运共同体”，携手共建“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以来，激发学术界重新研究在古代中外交流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热情。佛教学界也抱着极大热情推进对两个丝绸之路与中国佛教文化关系的研究。

以下根据笔者多年的研究并参考相关资料，对古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印、中亚佛教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的杰出高僧的事迹作简要介绍。

一、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佛教文化

大约从汉代以后，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与欧亚各国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除通过今新疆和中亚各国的陆上通道外，尚开辟了海上的通航道路，主要指中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各地港口连接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南亚与印度的海上通道，著名的港口城镇有登州、宁波、扬州、泉州、广州等，还有其他临时性的登陆或出海的地方。因为古代中国丝绸是主要贸易商品，所以后世将连接中外的陆上通道称为丝绸之路，而将后开辟的海上通道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公元前后的两汉之际，佛教从古印度开始传入中国，此后陆续有来自南亚、东南亚、中亚的僧人到中国传法，带来大量佛典和其他佛教文物，也有很多中国僧人到印度及其他国家求法取经、传法。自古以来，连接中印和东南亚、南亚的通道除了陆上丝绸之路之外，尚有逐渐拓展的海上丝绸之路。这种交流既促进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也将实现民族化的中国佛教乃至以佛教为载体的中国文化传到韩国、日本等国。在这个过程中，增进了中国和印度、亚洲各国的彼此了解和历史友谊。

二、法显西行求法与大乘佛性思想传入中国

法显生活在东晋十六国的后期和南北朝初期，与唐代赴印求法的玄奘、义净一样，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法显(?-423年前)俗姓龚，平阳(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汾水以西)人。在后秦弘始元年(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与慧景等四人从长安出发西行，到印度“寻求戒律”，先经过今新疆地区、中亚各国，然后进入古印度境内，游历各处佛教圣地，求师寻经，最后渡海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游历求法。在14年间，“凡所游履，减三十国”，历尽千难万险，于东晋义熙八年(412)七月携带求得的梵文经典搭乘商船，在遭遇狂风恶浪后终于漂泊至山东崂山登陆回国，在中国与印度南亚佛教文化交流史上，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出光辉灿烂的篇章。

东晋义熙九年(413)三月，刘裕征灭刘毅从江陵东归，经部下推荐将来自长安的印度僧佛陀跋陀罗带到建业(今南京)，安置住于道场寺。法显从崂山登陆后，先后受到青州长广郡(治所在今即墨一带)太守李嶷、镇守京口(治今江苏镇江市)的兗青二州刺史刘裕之弟刘道怜的接待，也于义熙九年到建业，应请住进道场寺。

此后，法显与佛陀跋陀罗二人在宝云的协助下翻译从天竺、师子国带回的梵文经典。法显原带回梵文经典10部，仅翻译出其中4部(加上从一部中析出者为5部)，包括《摩诃僧祇律》四十卷、《摩诃僧祇比丘尼戒本》(从《摩诃僧祇律》中析出)一卷、《大般泥洹经》六卷、《杂阿毗昙心》十三卷、《杂藏经》一卷、《方等泥洹经》二卷(或作三卷)，以上共6部63卷。此外，法显带回的《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弥沙塞律》(《五分律》)、《萨婆多律抄》《摩诃僧祇阿毗昙》及称为“綴经”的梵文经典，皆没有翻译。

法显带回并译出的《大般泥洹经》六卷，在中国最先传递了标志大乘佛教发展新阶段思想的“佛性”论，宣说一切众生皆有与佛一样的本性(佛性)，人人可以成佛。然而却说“一阐提”(善性灭绝的恶人)没有佛性，不能成佛。在法显以前到达建业的鸠摩罗什的弟子竺道生(355-434)，在法显译出《大般泥洹经》后，立即深入钻研，“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高僧传》卷七《道生传》)当时北凉昙无谶所译四十卷本《大涅槃经》尚未传到江南，道生是从逻辑推理提出这一结论的。既然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么“一阐提”是众生，当然也有佛性，也能成佛。因为道生是“孤明先发”，没有佛经的根据，受到当时守旧僧人的排斥，甚至被开除僧团，直到明言一阐提也有佛性的《大涅槃经》传到江南，他才得以恢复名誉。道生是南北朝时期涅槃学派的创始人，对推动中国佛教义理的发展，文化思想史上心性学说的传播，影响很大。佛性思想是建构隋唐佛教宗派教义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

法显记述自己西行求法的经历，成《佛国记》一卷，不仅记述了现中国新疆地区的地理、

佛教、风俗等,而且也记述了现在中亚一带克什米尔地区、阿富汗国,南亚的巴基斯坦国、印度国及斯里兰卡国很多地方的佛教乃至政治、经济和文化习俗情况,对于了解和研究5世纪初中国新疆地区和中亚、南亚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具有重要价值。《佛国记》与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都是蜚声国际学术界的中国历史地理名著。

法显西行求法的感人事迹对后来西行求法僧人具有很大激励的作用。南朝宋永初元年(420),黄龙国(今辽宁朝阳一带)僧昙无竭“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誓”,于是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等二十五人出发到印度求法,经罽宾国进入印度,最后随舶泛海从广州回国,带回梵文《观世音受记经》一部(《高僧传》卷三)。唐代玄奘到印度求法前曾表示:“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三藏法师传》卷一)义净自幼“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宋高僧传》卷一《义净传》),后从海路到印度求法取经。

三、智严、佛陀跋陀罗与《华严经》

佛教传入中国时,印度已开始形成大乘佛教。在此后的年月中,中国同时接受来自印度或中亚的大小乘佛教,将大小乘经典译为中文。大乘佛教从思想上来分,大体分为属于空宗系统的经典和属于有宗的经典。后秦鸠摩罗什在长安译经,所译大乘经典多为空宗系统的经典,代表经论有大小品《般若经》和阐释般若空义的《中论》等。大乘有宗经典传入稍晚,在鸠摩罗什之后进入长安而不久渡江南下的印度僧佛陀跋陀罗所译的《华严经》(唐代有新译《华严经》),是属于大乘有宗系统的重要经典,以弘传真如(法性)法界缘起和诸法圆融无碍的思想著名,是华严宗依据的基本经典。华严宗创始人法藏称《华严经》属于圆教(圆满、圆融之教),宣说“性海圆融,缘起无碍”,法界缘起是“相即相入,如因陀罗网,重重无际,微细相容,主伴无尽”的。当然,《华严经》对其他宗派也有很大影响。

佛陀跋陀罗(或作佛驮跋陀罗,音译觉贤,359—429),原籍迦毗罗卫(在今尼泊尔国),是罽宾(今克什米尔)摩天陀罗精舍著名禅师佛驮先(或佛大先)的弟子,在禅法上有很高的造诣。

据法显《佛国记》记载,西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僧智严,原与宝云、慧简、僧绍、僧景等人结伴西行求法。后秦弘始二年(400)在张掖与法显等人会合结伴同行,后来因返回高昌化缘,与法显分手。据《高僧传》卷三《智严传》记述,智严后来独自辗转到罽宾求法,时间当在弘始三年(402)左右。他先入摩天陀罗精舍事师佛驮先,学习禅法三年,在听说佛陀跋陀罗的声望之后,便邀请佛陀跋陀罗到中国传法。佛驮跋陀罗当即表示同意。

大约在后秦弘始九年(407),智严与佛驮跋陀罗二人踏上通往中国的路程。他们走的路线是先陆路,后海路。据《高僧传》卷二《佛驮跋陀罗》记述:他们离开罽宾,“步骤三载,绵历寒暑,既度葱岭,路经六国,国主矜其远化,并倾心资奉,至交趾乃附舶……至青州东莱

郡。闻鸠摩罗什在长安，即往从之”。看来是先北向越过葱岭，然后往东南方向走，在沿途得到各地国主的施舍照应，经过三年，辗转到交趾（今越南）搭船，从海路从中国青州东莱郡（治今山东莱州市）登岸。听说鸠摩罗什在长安翻译佛经，稍事停留便赶往长安去投奔，大约在后秦弘始十年（410）到达长安，被后秦朝廷安置住在大寺。

鸠摩罗什是在后秦弘始三年（401）被后秦王姚兴派人迎请到长安的，在弘始十五年（413）逝世，一生共译经35部294卷。

佛驮跋陀罗到长安后，曾与鸠摩罗什关系十分融洽，然后过了一段时期，竟遭到鸠摩罗什弟子的排斥，不得已与弟子慧观等四十余人离开长安南下。佛驮跋陀罗先应庐山慧远邀请到东林寺翻译《达摩多罗禅经》等经，一年后到江陵，后被东晋太尉刘裕请到建业（今南京）道场寺翻译佛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很大的《华严经》六十卷、梵本是法显从印度带回的《大般泥洹经》六卷等，就是以佛陀跋陀罗为译主翻译的。

智严也离开长安东下，先寄居于山东的一所精舍，“坐禅诵经，力精修学”。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太尉刘裕（后篡晋建宋，即宋武帝）率兵帝西伐长安，取胜回朝途经山东，经手下王恢的推荐，请智严同回建业，安置于始兴寺。智严在建业将他从罽宾带回的梵本佛经陆续译出，共有10部31卷（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五），其中有《无尽意菩萨经》《法华三昧经》《广博严净不退转轮经》《四天王经》《普曜经》《净度三昧经》等。

智严晚年再次经过海路到印度，在转往罽宾途中无疾逝世，年七十八岁。

四、求那跋陀罗与《胜鬘经》《楞伽经》

求那跋陀罗（386—450），意译功德贤，中天竺人，出身婆罗门种姓，出家先学小乘，后改奉大乘，受菩萨戒法，精研《大品般若经》《华严经》等，因号“摩诃衍”（意为大乘）。在游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国后，乘船到中国。南朝宋元嘉十二年（435）从广州登岸，北上京城建业，初住祇洹寺，受到名僧慧严、慧观等人的欢迎，并得到宋文帝和颜延之等朝臣的礼敬，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丞相南谯王刘义宣皆归依师事之，后门下徒众达七百余人。求那跋陀罗特别受到刘义宣的崇敬和供养，在他身边达十年之久。后刘义宣反叛兵败被孝武帝赐死，经察求那跋陀并未参与军政，对他宽宥并予以尊崇，让他译经。

求那跋陀罗在宝云、慧观和法勇等人的协助下，先后译出佛经52部134卷，其中对中国佛教影响大者有《杂阿含经》五十卷、《胜鬘经》一卷、《楞伽经》四卷。

《阿含经》是现存记述原始佛教事迹和教义的基本经典。汉译有四部，其中求那跋陀罗所译《杂阿含经》就是其中的一部，其他有长、中、增一《阿含经》。

《胜鬘经》中讲如来藏思想。如来藏是佛性的另一种说法，谓是“如来境界”、“如来法身”、“不离烦恼藏，名如来藏”；是“出世间上上藏，自性清净藏；此自性清净如来藏而客尘烦恼上，烦恼所染”，是常住不灭的。是说如来藏是一切众生所具有的被世俗烦恼掩覆染污的佛的法身、佛性。